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詹伯慧自选集

詹伯慧◎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詹伯慧自选集

詹伯慧◎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詹伯慧自选集/詹伯慧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11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 (系列一)]

ISBN 978 - 7 - 306 - 05411 - 1

I. ①詹… II. ②詹… III. ①汉语—文集 IV. 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9120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廖泽恩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廖丽玲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电话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e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0 印张 3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詹伯慧

1931年7月生，广东饶平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名誉教授。曾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长期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及汉语应用研究。早年参编袁家骅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曾任《汉语大字典》编委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汉语方言分支副主编。出版专著近40部，多部著作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成果奖；发表论文400多篇。1992年、1997年两度获评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6年获暨南大学授予的“终身贡献奖”。先后受聘到日本东京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以及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现正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与数字化建设”工作。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编 委 会

主 任 慎海雄

副主任 蒋 斌 王 晓 李 萍

委 员 林有能 丁晋清 徐 劲

魏安雄 姜 波 嵇春霞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出版说明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是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改革开放 30 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离不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广东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目标更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省委明确提出，要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提升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形象和影响力。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调研时强调：“要努力占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高地，扎扎实实抓学术、做学问，坚持独立思考、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提升研究质量，形成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优势学科、学术权威、领军人物和研究团队。”这次出版的“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就是广东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的一项重要工程，是广东社科界领军人物代表性成果的集中展现。

这次入选“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的作者，均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2011 年 3 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启动“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

评选活动。经过严格的评审，于当年7月评选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16人。他们分别是（以姓氏笔画为序）：李锦全（中山大学）、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陈鸿宇（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饶芃子（暨南大学）、姜伯勤（中山大学）、桂诗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莫雷（华南师范大学）、夏书章（中山大学）、黄天骢（中山大学）、黄淑娉（中山大学）、梁桂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蓝海林（华南理工大学）、詹伯慧（暨南大学）、蔡鸿生（中山大学）。这些优秀社会科学家，在评选当年最年长的已92岁、最年轻的只有48岁，可谓三代同堂、师生同榜。他们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体现广东文化软实力的学术标杆。为进一步宣传、推介我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根据省委宣传部打造“理论粤军”系列工程的工作安排，我们决定编选16位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这便是出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的缘起。

本文库自选集编选的原则是：（1）尽量收集作者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专著中的章节尽量少收。（2）书前有作者的“学术自传”或者“个人小传”，叙述学术经历，分享治学经验；书末附“作者主要著述目录”或者“作者主要著述索引”。（3）为尊重历史，所收文章原则上不做修改，尽量保持原貌。（4）每本自选集控制在30万字左右。我们希望，本文库能够让读者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岭南大家的思想世界，领略其学术精华，了解其治学方法，感受其思想魅力。

16位优秀社会科学家中，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身体欠佳，有的工作繁忙，但他们对编选工作都非常重视。大部分专家亲

自编选，亲自校对；有些即使不能亲自编选的，也对全书做最后的审订。他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学风，令人肃然起敬。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除了16位优秀社会科学家外，我们还得到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每三年评选一次。“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将按照“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要求，陆续推出每一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把这些珍贵的思想精华结集出版，使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之薪火燃烧得更旺、烛照得更远。我们希望，本文库的出版能为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做出积极的贡献。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编委会
2015年11月

詹伯慧教授，1931年生，广东省饶平县新丰镇人。1953年毕业于由王力教授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和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在武汉大学任教30年，历任武汉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3年调入暨南大学任教授，1985年任暨南大学复办后首任文学院院长，兼任汉语方言研究室（1994年更名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名誉教授。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1991年开始招收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迄今詹教授已培养博士研究生29人、硕士研究生9人，其中包括来自港、澳、台的博士生5人、硕士生2人。1994年我国首批5名攻读汉语方言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授博士学位，其中出自詹伯慧教授门下的就占了4位。如今詹教授的门生都已成为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语言学界把这支富有活力的汉语方言研究团队戏称为“詹家军”。

詹伯慧教授从教62年（1953—2015）来在汉语方言、汉语辞书、汉语应用和汉语规范等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教学工作，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早年参加由北京大学袁家骅教授主持的《汉语方言概要》的编写工作，负责编写粤方言和闽南方言两章，编写内容约占全书50万字中的1/3。此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方言的著作，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他在辞书的编纂方面也有卓著成绩，曾担任《汉语大字典》编委多年，主持该字典的收字审音工作。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方言分科的副主编，撰写了许多方言方面的条目。近期他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与数字化建设”，负责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约400万字），这部词典为我国历史上最大型的方言及方言

学大词典，预计近三年内便可完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詹教授屡屡应聘到境外一些著名的学府讲学。1980年至1982年，他作为教育部推荐的首位学者受聘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两年，为中日两国语言学界的学术交流开了先河。他的《现代汉语方言》一书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当年他在日本培养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为日本汉学界的知名学者。此后，詹教授先后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1990）、新加坡国立大学（1998）、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1998）、香港大学（1986、2000、2004—2015）、香港中文大学（1987、1992）、香港科技大学（2005）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1995）等著名学术机构担任客座教授或开设讲座。他所授的课和他所作的学术讲演都给听讲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普遍的赞誉。

詹伯慧教授已出版著作近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先后出版过《汉语方言文集》（日本东京龙溪书舍，1982）、《语言与方言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方言·共同语·语文教学》（澳门日报出版社，1995）、《漫步语坛的第三个脚印——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2006增订本）、《詹伯慧语文评论集（1953—2008）》（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五部个人论文选集。近期他还主编了一套通俗性、应用性的《大家小书》，他自己的《语文杂记》（2010）出版，赢得语言学界的普遍赞誉。他主编的广东省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成果《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1987、1988、1990）、《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4）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8）等多次获评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和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他主编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获评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进入21世纪以来，由他主编、粤港澳三地一批粤语学者共同编纂的《广州话正音字典》（2002）以及由他主编、他的几位博士生协力完成的《广东粤方言概要》（2002）相继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赏。《广州话正音字典》为我国第一部方言正音字典；《广东粤方言概要》于2005年5月荣获广东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政府奖），这是广东语言学科大量著作中获此殊荣的唯一一部著作。詹教授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和1997年他连续两度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1997年暨南大学授予他“八五”（1991—1995）期间杰出科研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评为暨南大学优秀研

研究生导师，2002年又被评为暨南大学“十佳先进个人”。2006年，暨南大学授予他终身贡献奖。2011年6月，他更获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成为全省获此殊荣的16位社会科学家中唯一一位中国语言学家。他的业绩被海内外许多名人辞典所刊载。

詹教授于1988年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3年和1998年又连续两届出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连续15年在全国“两会”中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获得过第九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詹教授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自1988年起连续两届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又被推举为暨南大学首任老教授协会会长，现任该协会名誉会长。目前，詹教授仍担任一些相关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如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顾问、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等。他还是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曾任第一、第二届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并曾被广东省人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达10年（1991—2000）之久。

我跟语言学的六十载情结

——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而作^①

詹伯慧

岁月如歌，正值神州亿万人民乐享国泰民安、齐心追逐中国梦之际，我这老头儿已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来日无多的暮景残年了。按照国人的平均年龄，我早已越过了临界线，多“赚”了好几年了。可时至今日，我始终没有退出工作前线的倦意，我总觉得自己还有许多该做而未做的事情，总想争分夺秒去完成、去实现。这应该算是不自量力吧。三年前在我踏入八十高龄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采访了我，以“一生献给方言学”为题发表了专访，当时我想到的是：我这一生还没到终点，说成“一生”，一是溢美之词，二是对我多少也有点鼓励的作用。这些年来，我始终“退而不休”，继续干我热爱的语言研究工作。我多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发挥一点余热，为我毕生从事的语言学事业再献一点绵薄之力啊！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仍然本着边学边干的精神，时刻关注语言学领域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尽量吸取新鲜的学术营养，使自己能够不掉队，能够与时俱进，跟上我国语言科学前进的步伐。

回顾60年来我走过的学术历程，打从年轻时期开始接触“学问”这两个字以来，就一直跟语言打交道，语言研究的情结长期缠绕着我，让我一辈子离不开它。直到今天，尽管我已垂垂老矣，但既然退而未休，想的做的也还都是语言专业的事。近期接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与数字化建设”的任务，又得三五载泡在方言工作上面，说明我对语言（方言）的研究依然那么执着，总该会“从一而终”吧！

我和语言研究的情结如此深厚，还得从我的语言背景说起。我生长在粤东潮州一个兼容闽、客两大方言的双语家庭中。父亲是饶平县的客家

^① 本文以“我与语言学结缘六十载”为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7日。

人，母亲则是潮州市郊著名瓷都枫溪人，他们是百年名校韩山师范学院的师生。我出生在潮州城内，属于闽语的潮州话自然也就是我儿时的第一母语了。老家饶平县的山区，到处是一座座圆形的客家土楼。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入侵粤东，潮州难免于难，我们连同外公外婆就都避难到饶平山区的老家，由此我的童年语言环境开始有了改变，除了和母亲及外公外婆依旧说潮州的闽语外，跟父亲和饶平家乡人，尤其是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又都习惯于说饶平客家话了。从那时起，我的语言交际就一直是闽方言和客家方言交错使用的双语格局。抗日战火遍地燃烧之际，父亲执教的中山大学从云南迁至粤北坪石，他就把我从老家接到身边，让我在坪石广同会馆办的用粤语教学的小学上高小，这又使我有机会很快熟悉了粤语，能顺利利用粤语和老师同学交谈，并为我“抗战”胜利后到广州上高中上大学，以至毕业后长时间从事语言的调查研究，打下了粤语习得的基础。语言生活的多样化，三种方言同为母语使用的习惯，对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走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我长期跟语言研究结缘创造了条件。

我在1949年进入大学，读的是由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的、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那时候，语言学在中国是冷门，人们只知道在大学里有主要研究中国文学的中文系，却很少想到会有专门研究语言的语言学系。在法国留学专攻语言学的王力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回迁北京途中经过广州，留下来担任中大文学院院长。这时他有意改变大学中文系重文学轻语言的偏向，大力倡导培养语言学的专门人才。在中山大学校长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就在中大办起了语言学系，聘请了同是留法专攻语言学的岑麒祥教授出任系主任。语言学系开设了涵盖语言学各个方面的课程，如语音学、现代汉语语法、语法理论、方言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以及涉及传统语文学的中国语文概论、音韵学、中国文字学等，还有由岑麒祥教授主讲的选修课“世界语”。我在1949年入学时，全班有7个同学，加上此前已入学的同学，全系就只有13个学生；而教师呢，一共有10位之多，大多数是知名的教授。记得我们毕业那年，师生的毕业聚餐就在王力先生家里的客厅摆上两大圆桌，全系师生加上师母热热闹闹，商承祚老师还即席清唱京戏助兴呢！母校语言学系当年为我们所提供的优越学习条件和师生一家亲的深厚情谊，60年来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实在难以忘怀！我们这些有幸负笈于中大语言学系的学子，毕业后大都兢兢业业地走在建设我国语言科学的大道上，这跟求学时期比较系统全面的

专业学习、高素质名师的教导和浓郁的语言学术氛围是分不开的。对于我这个从小具有特殊语言背景的学生来说，语言学的情结更由此而生，逐渐在心中生根发芽。

大学毕业那一年，王力先生为了使我们通过实践掌握语言调查的基本技能，特意跟时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的严学窘教授联系，让我们七个人到那里去调查少数民族学员的语言。七个人分成三个组，我就和唐作藩兄一起，调查了广西仡佬族的语言。通过两个星期的记音整理，我们完成了这份作业，提交了调查报告。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我对当时国家进行的语文改革很感兴趣，加上在学期间曾积极参加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有意在这方面写篇论文。王力先生得知我的想法，建议我就以“文字改革”为题撰写毕业论文，并主动承诺担任我的指导教师，还把他早年出版的专著《汉字改革》拿来给我参考，使我深受感动。毕业离开中大时，王先生谆谆叮嘱我，要珍惜我拥有多种方言母语的条件，今后多做方言的工作；他还提到国家要进行语文规范化工作，推行共同语也离不开方言的调查研究。我知道当时王先生自己也写了为方言地区学习“国语”（普通话）用的书。他的教诲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大学毕业后一直投身于方言调查研究和语言规范、语言社会应用的工作，走的正是王先生当年给我指引的道路。

为了让我的方言学基础打得更扎实，1955年王先生在北大又把我推荐给方言学大师袁家骅教授，让我到北大去跟随袁先生进修方言学。我在那里一待两年，在袁先生的指导下参加了我国首部系统论述汉语各方言的著作——《汉语方言概要》的编写，期间家骅师还让我随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远赴海南岛调查黎语半年，体验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专业需求与生活磨炼。这两年的业务实践，为我此后矢志不移地走语言研究之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一头栽进各种稀奇古怪的语料中，却始终没有忘记王力先生在我离开大学生生活时给我的教导：坚定不移地把方言研究和语言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和贯彻、实施我国的语文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和亿万人民的社会语言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紧紧抓住这几个结合，方言工作就会充满活力，就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就会摆脱“冷门”的困境，焕发勃勃生机。

我这几十年来的学术活动，虽然始终以方言学为主线，实际上一直是汉语方言研究与语言应用研究并举的。例如，对于辞书的编撰，我一直认

为既是传播科学文化、普及各类知识的重要举措，也是解决语言应用中各种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因此，我对辞书的编纂可谓情有独钟。从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我就先后加入编纂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行列，忝为这两部辞书的编纂人员。80年代初我应聘在东京大学讲学时，日本学者为我出版的第一本选集是《汉语方言文集》（日本东京龙溪书舍，1982），选入的是我早期撰写的方言研究论文；但自90年代以后，我陆续出版的几部选集，内容就都是语言的论述与方言的论述兼备的了。如1993年的《语言与方言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的《方言·共同语·语文教学》（澳门日报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6年增订的《漫步语坛的第三个脚印——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以及2008年的《詹伯慧语文评论集（1953—2008）》（暨南大学出版社）等。

总之，在我历来所发表的文章中，属于描写、探讨、论述方言问题的，其实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就我的方言研究来说，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我自己认为是：比较重视方言的理论探讨，比较重视方言的应用研究，在方言研究中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这一思想明显体现在我已发表的许多著述中，本书选入的文章和附录的相关评论，同样有所反映。这或许就是我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形成的学术路向、学术风格吧！

60年来的学术生涯，我接触过的方言很多，但我并没有对每个接触到的方言本体问题，包括语音问题、词汇问题和语法问题等等，一一进行微观的深入探讨，而是比较着力于根据接触到的方言现象，进行有关方言问题的理论探索。我觉得这类具有宏观视野的理论探讨，对于加深认识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推动方言学科的建设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方言学界，做方言本体微观研究的很多，做有关方言理论探讨的却比较少。有鉴于此，我在自己的方言研究中，就有意多思考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也撰写了一些综合论述的论文。例如，关于方言和共同语关系的问题，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问题，关于语言规范化和语言应用多元化的问题，关于共同语和方言的双语并用问题，等等，都常常在我的脑子里打转，诱发我动笔为文的念头。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就积极参加贯彻推行我国语文政策的各项工作，视之为新时代语言专业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但同时，我又始终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作为我学术工作的主线。我深知实行汉语规范化与调

查研究各地方言是互不矛盾的两件事，两者都是建设中国语言学的重大课题。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并不以消除方言在社会上的流通为目的。在大力推行共同语的同时，仍然要保留各地的方言，让我们的社会出现既大力推广共同语，又继续发挥方言作用的双语并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生活格局。这样的社会语言环境，对于构建当今人们常说的“和谐社会”，自然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语言的运用牵涉到社会上每个人，但是，并非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明白方言和共同语这种“推广一种（共同语），保留多种（方言）；有主有从，并存并用”的关系。在雷厉风行推行普通话的时候，由于语文知识不够普及，人们对语文政策又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难免出现一些误解，错以为“推普”是要让方言在社会上消失，是要把方言扫地出门。面对种种误解，我多年来陆续就方言和共同语的问题发表了不少意见，阐明我作为一个语言专业工作者的看法。这方面的论述自然也就在我的方言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了。

近期，随着对方言作为国家重要语言资源的认识逐步加深，方言资源的发掘与运用、方言在社会语言生活中享有的地位、方言在地域文化承传中所发挥的作用等许多有关方言的问题都深受社会关注，我们从事方言研究的人，自然更应该就这类问题多做理论上的探讨和引导了。方言的社会关注度日渐增长，我对方言的应用问题也倍加关切。我经常想到我们老一辈语言学家，像吕叔湘先生、王力先生等，总是谆谆嘱咐我们，要关注语言的社会应用，要让我们的语言研究产生社会效益，要多多普及语文知识。他们身体力行，在从事高层次语言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写了不少通俗性、应用性、普及性的语文“小册子”。语言研究要为语言应用服务，前辈大师们的学术实践使我深受教益，铭记在心。我想，语言研究要为语言应用服务，难道作为我国语言资源重要组成的汉语方言，就可以不考虑它的应用问题？

如前所述，在举国上下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语的时候，人们产生对地方言的误解，以至误认为方言只存在研究、存古的价值，在社会应用上并不发挥作用。这种对方言的错位认识，现在到了应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为此，打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着意在方言的应用方面多做文章，以至于汉语方言的应用研究成为我晚年学术思考中的主要着力点。这一情况集中反映在我于2005年《语文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汉语方言的研究及其应用——纪念吕叔湘先生》和2008年6月《粤语研究》第3期上发

表的《粤语研究与粤语应用》这两篇文章上。其实，围绕着方言的应用开展学术活动早就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所体现。例如，我一直把编写方言教科书看作方言学建设的重要一环。从20世纪50年代参加袁家骅师编纂《汉语方言概要》到90年代组织几位同道编写《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被国家教委推荐为全国高校方言学教材），这几十年间，我都把编写方言学教材，为年轻学子提供方言学入门用书当作方言研究为方言应用服务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末，鉴于粤方言读音存在分歧，影响到粤方言的应用，我用了十年的时间组织粤、港、澳的粤语学者开展了粤语的审音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出版了《广州话正音字典》，这本书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本为方言正音的辞书。这类为方言的应用提供服务的工作，我是一直坚持在做的。跳出只单纯钻牛角尖做方言本体研究，把视野扩大到方言的应用研究上来，既要深入研究方言的本体，细心发掘方言的特色，也要为方言的社会应用多做研究，这可说是我晚年主要的学术思想。前几年，我为出版社组织约请一批语言学界的知名学者协力编写一套《大家小书》。我作为主编，自己先汇集一批应用性、通俗性的小文编成《语文杂记》出版，反应相当不错。我自己认为，这正是承传吕叔湘、王力等前辈学者的良好学风，在语言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的道路上迈出的步伐。为了使前辈学者重视语言应用的学风代代相传，我希望我们的语言学者都来关注语言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常为人们忽视的方言应用问题。

在这本选集付梓之际，我边想边写地录下了自己60年来走过的学术历程，杂乱无章，就算是一篇极不完整的学术回忆录吧！